

（二〇一七年七月四日出版）

本期目录

【往事非烟】	红色作家的文革生涯	邢小群
【亲历者言】	我在清华参加文化革命	胡宗华
【亡灵祭坛】	红歌背后的哀歌	赵越胜
【史实辨析】	评舒声对《抢救记忆》之评（上）	王复兴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往事非烟】

红色作家的文革生涯

• 邢小群 •

〔原编者按：“文革”作为一场政治运动至今已发生51年了。虽然这对整个国家形成灾难性的冲击，对整个民族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但我们经历了半个世纪，居然整个社会并没有形成一种深刻地共识，也没有从根本上对它进行彻底地反思、更没有揭示其事件发生真正的政治与文化的根源。并且，还有不少人不仅不认为其对人类文明的浩劫与反动、对人性人道的扭曲与羞辱，反而还加以肯定和称颂，认为它还是中国进步的一种别无选择。不久前竟然还在几个省市发生了局部的文革回潮，死灰复燃。这样的误区或混淆必须彻底澄清，这样的毒化现象必须再次拨乱反正。2015年间，我们约请了中外数位文革的亲历者和研究者，进行了一次专题系列访谈。以他们的见闻和认识，从更多不同角度可为今天的青年读者揭开“文革”运动的面相和迷雾，让更多人学会从历史的悲剧中醒悟，从而走向常识和理性，为自己，也为未来可以健康发展的中国。〕

徐友渔：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请来谈论文化大革命的嘉宾是邢小群。邢小群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请她来是这样一个原因，她的父亲叫邢野，文化革命前就是中国著名的作家，他最重要的作品是电影《平原游击队》，在中国当时家喻户晓，所以他父亲是一个受到高度赞扬的、具有很高荣誉的一个革命作家。但是文化革命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历来其他政治运动都没有，就是很有资格的、很革命的、很有影响的作家也通通打翻在地，说成是修正主义，说成是黑帮。他们的经历是非常悲惨的。今天为了让大家了解这么一个现象，请邢小群来讲以他父亲为中心的一批革命作家在文化革命受到的反常待遇。首先想问问邢小群，你父亲的作品为什么会一炮走红？当初他在中国的影响是什么样的？

邢小群：上世纪50年代初期，我父亲写了一个话剧剧本叫《游击队长》。当时，他在中央文学研究所做行政处长。父亲想让文学研究所所长丁玲推荐到《人民文学》发表。谁有好作品，所长丁玲都会扶持。丁玲说，《人民文学》通常不发表剧本，她把这部作品推荐给了电影局局长陈荒煤。而后，陈荒煤和丁玲商量把父亲调到文化部电影局剧本创作室改剧

本。在1955年，根据《游击队长》改编的电影《平原游击队》上演了。和他一块改编的作者还有羽山。羽山在改编电影方面，比我父亲有经验。当时中国电影比较少，加上这是反映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故事，主角李向阳比较突出，所以家喻户晓。其实人们对父亲名字并不怎么熟悉，对这个电影却比较熟悉。

徐：他能够写出这么一个有革命内涵的《平原游击队》，早年是不是跟中国革命有什么关系？他的生活经历是怎么样的？

邢：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冀中一带活动，在冀晋军区三分区文工团。先是在冲锋剧社做编剧、导演，后来做文工团团长。所以他对这一带很熟悉，李向阳是一个他酝酿了很久的、有原型的人物。

徐：这么说你父亲很年轻的时候就投身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里面去了，是有一定革命资历的人。是不是？

邢：对，1937年抗战爆发时，他是个高中生，他跟同学不愿意在沦陷区生活，就流亡到南方，参加国民政府第三厅组织的演剧队，转了一大圈后去了延安，入了陕北公学。他在天津上中学时就喜欢演剧、看剧、编剧，所以一去延安，就进入了陕北公学的文工团，后出发到冀中，仍在联大文工团。

徐：说起来，你父亲算文工团里少有的知识分子了，是不是？

邢：也许他在革命队伍里算文化水平偏高的，他当时已经上到高中二年级了。

徐：吴法宪回忆录里面写道，高小生就算知识分子，那你父亲说起来算革命队伍里的大知识分子了。既然是这么一个有知识、有成就，写了一个家喻户晓的电影剧本的人，文化革命中怎么倒霉的呢？

邢：他在作家里就算是幸运的，不算太悲惨。真正悲惨的是他的一些老朋友。1965年年底，我父亲已在山西作家协会工作，山西省宣传部突然通知他：中宣部通知你赶快去北京。父亲1966年1月到了北京，林默涵说，你赶快到华侨饭店去报到，周巍峙会跟你宣布是什么任务。林默涵当时在中宣部，周巍峙在文化部，他是歌唱家王昆的丈夫，也是个老艺术家。林默涵说，他在等你们，你赶快去。他说的“你们”，是指写《敌后武工队》的作者冯志、写《白毛女》的作者贺敬之，电影导演崔巍，写《野火春风斗古城》的作者李英儒，和我父亲邢野。

徐：都是革命队伍里最顶尖的艺术家。

邢：他们这批人力量很雄厚。让他们干什么呢？让他们修改电影《平原游击队》。（徐：为什么要修改呢？）话要再拉远一点。在1964年到1965年期间，毛泽东说作家协会是裴多菲的俱乐部，已经沦落到修正主义的边缘。那时江青插手文艺界，提出从30年代文艺界就存在一条黑线。她不断扩大批判的名单。我记得有《逆风千里》、《舞台姐妹》、《李慧娘》，一大批，越批越多。江青认为《平原游击队》属于稍微拔一拔，就能进入样板戏行列的作品。因为电影里有一个很突出的英雄人物李向阳。后来就决定集中顶强的艺术力量来修改《平原游击队》。他们一到华侨饭店就听宣布说：江青让你们来修改《平原游击队》。于是，每人拿到一个打印的电影剧本，先自己看，写意见，然后再碰头商量。过几天，林默涵组织他们汇报一次，有一次还是在中南海汇报的。江青的意见是，区委书记的

形象很弱，党的领导，要加强。那时还没有总结出“三突出”、“高大全”。（徐：主人公的形象不是那么“高大全”。）她的思想也在不断“完善”。她要求这些人的修改向“三突出”、“高大全”靠拢，尤其是党的领导。作家们觉得，让区委书记丰满一些不难，整体怎么提高呢？因为江青说有一条黑线，党的问题，历史问题，稍微不注意就撞了高压线了，所以大家觉得没有办法修改。90年代我跟父亲聊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这些人每天扯闲篇，动不动就去逛大街。上头让汇报，就应付应付。

徐：看起来，你父亲还是一个比较平和的人，离“八个样板戏”只有一步之遥了，差点就进入江青的文学圣殿里了。但是他当初没有看重此事，否则努一把力就变成一个大红大紫的人物了。他怎么就选择顺其自然了呢，本来这是鲤鱼跳龙门的机会啊？

邢：他也没有那么高的觉悟。让他去修改，重新去弄他的作品，他当然还是很高兴的，但是他也知道不好改，因为身边有好多作家作家都落马了。他是非常小心的人，也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人。（徐：这件事就是无疾而终了是吧？）1966年的五、六月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五一六通知”以后，就要求他们这些人都回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他们就纷纷都回去了。

徐：他革命资历那么长，地位也还不错，甚至还有点行政职务，可是，文化革命没有成为红人，成为党依靠的对象去革别人的命，那是怎么回事呢？

邢：他也有点经历。我父亲原来在北京中国作家协会工作。1965年跟赵树理他们一块从中国作家协会调出来的，到山西作家协会。毛泽东的“两个批示”出来以后，一些驻会作家必须离开北京。他在山西没什么名气，因为他属于河北作家。文化革命刚开始，山西那些资深的作家，如：赵树理，是家喻户晓的大作家，过去他的作品都进入中学课本的；马烽的作品也是进入中学课本的。马烽和西戎一起写过《吕梁英雄传》。山西著名作家是：“西李马胡孙”（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孙谦，是著名的电影剧作家，李束为是当时的文联书记。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们这些前沿的作家全部落马。尤其是赵树理，首当其冲，人人都有权批判，各个单位争先恐后地把他拉出来，游街示众。那时候我还很小，亲眼看见在大卡车上给他们挂上大牌子，带着大帽子，写着“黑作家赵树理”，“黑作家马烽”等等；“大黑帮”、“大叛徒”、“黑线人物”，什么名目都给他们按上。那气势是非常吓人的。我父亲当时在山西作协没有知名度，在山西境内没有太大的影响，大家还不知道。知道《平原游击队》但是跟这个人联系不来。但是他的级别跟那些人差不多，所以他也害怕。

徐：赵树理、西戎、马烽这些人会倒霉，这里面还是有一些费解的地方。他们这些作家，第一是革命资历很长，完全是长期扎根于中国的农村基层。（邢：从解放区上来的。）都是红色背景。他们和其他的名作家还不一样，比方巴金很有名，大家都知道他有小资产阶级思想，他是留学法国的这类作家，过去很尊重他的名气与文化成就。而批赵树理，照理说，应该是批了共产党自己人。这种人，他的正统地位应该是牢不可破的，而且文化革命前也是红得发紫的，他们应该是依靠对象。后来你是搞文学的，据你的研究，他们这么倒霉，是什么原因？。

邢：我觉得这跟毛泽东认定文艺界滑到了修正主义边缘，是黑线专政有关。文艺界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突破口之一。江青在很多讲话之中已经提出了文艺界有一条黑线。（徐：就要说，他们是这条黑线上的负责人。）而且山西这帮作家还有一个软肋。1962年在大连开的小说座谈会上提出的“中间人物论”，是文革批判的一个重点。中间人物论的旗手是赵树理，然后是马烽，西戎，孙谦。这都是山药蛋派“中间人物论”的代表人物，说他们专门

写那种不好不坏的人，是修正主义思想，都违背了塑造英雄的“高大全”。所以叫他们全军覆没。

徐：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按道理，像你父亲，赵树理，西戎，马烽，应该是自己人了。为什么还要打倒？有一个很特殊的原因。第一是他们掌了权了。这次运动跟别的运动不一样，要把中国的事情横扫一片，把这个事情说成是修正主义占支配地位，掌权者就要对这件事情负责。另外一个，从文学创作上来说，虽然他们写的东西是革命的，我也觉得他们是在真心诚意地讴歌革命，写得非常生动，又有文学成就，影响也很大，但还是不符合江青那种更左的样板戏模式，那种更简单，更粗糙的创作。

邢：赵树理他们认为，在人民群众当中，特别英雄主义的和特别落后的都是少数，中间人物是大多数，所以他们写了一些中间人物，什么“赖大嫂”啊，“小腿疼”之类的，这就是群众，他们无所谓好和坏，只不过思想落后一点。他们写的这些中间人物，恰恰特别生动、活灵活现，给人留下的印象非常深。

徐：后来江青创造的样板戏，比方《龙江颂》或《智取威虎山》，他们塑造的人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甚至不结婚的，阿庆嫂丈夫也不知道是谁，在那儿？你稍微有一点人情味，要说的有一点风趣，有一点诙谐，有一点吸引群众，好像都不行。一定要写成那种面目严峻、刻板的东西才叫革命。其实我觉得这种左的文学是完全没有生命力的。你父亲那辈人还力求写一些贴近群众，反映群众生活的东西，这种东西都不行。

邢：赵树理写的小腿疼，说她串门不疼，赶集不疼，唯独让她下地干活她就疼。他写的正面人物都不如他写的这些普通的妇女。

徐：那后来你父亲在文化革命中间没有受到什么冲击？我听说他还逃跑过，还有武斗面临到他头上，他受到了冲击没有？

邢：他是碰到点麻烦，但是后来想办法躲过去了。（徐：是怎么回事？）他回到山西参加文革，一看，那么多熟人都挨斗了，上了大卡车，他害怕，有点心慌，就又返回北京。找到了李英儒，跟他说我在山西不能待了，可能下一波就轮到我了。李英儒问，你有没有政治历史问题？他说，我没有，我是清白的。李英儒说，那好，你就留下吧。我再给你从北京电影制片厂找两个创作员来，名义上你们就是来修改《平原游击队》。其实咱们修改那么长时间，也没修改成，这就是让你避避风。李英儒当时就是这样说的。这时他们名义上是中央文革文艺组下属的创作小组，在这个组里还有张永枚、闫肃、徐怀中等一些人。当时张永枚正在将《平原游击队》修改为京剧。但是最后江青对他这个剧本不太满意，又由崔巍修改一遍，改成了京剧《平原作战》。李英儒还说，浩亮那儿正在彩排《平原作战》，你去当导演吧，给你挂个名。我父亲说，那也行吧。他去了以后，提了点意见，浩亮不太在意。父亲觉得他挺傲慢的，心说，爱听不听吧，这事就那么过去了。他正在北京耗着，过了一段时间，我母亲听说山西有人要到北京去揪斗我父亲。原因是什么呢？后来我看了父亲写的自传才知道，天津财经学院有一个他的老同学揭发说，中学时他们有一个老师带着他们几个人（包括我父亲）参加了一个国民党的外围组织，叫忠社，忠诚的‘忠’，社会的‘社’。造反派知道了，一下子兴奋起来了，觉得我父亲属于领导层的人，不能这么便宜了他。听说两边的造反派都想去揪斗他，都在搞调查。我母亲听说后，立即让我到北京找他，让他能躲就躲过去。当时我才14岁，我母亲和我大姐把我送到火车站。文化革命的时候火车非常非常挤，因为都在大串联。我挤不上去，她们就把我从窗户塞进去，我是从人身上滚进去的。我在车上挤了一夜，到了北京，按照母亲给我的几个地址去找到父亲。那是个星期天，我在他的一个老朋友家找到了他。我说山西造反派要揪斗你，我妈让你躲一躲。我父亲说，那好吧。当

天，我们都住在他朋友家，第二天他把我带到他们创作组，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李英儒。父亲大概是要对李英儒有所交代。然后他对我说，你回去吧。就自己逃亡了。他逃亡到了冀中一带，冀中一带有他过去在根据地熟悉的老乡。（徐：那就是他以前的革命根据地，这时候派上用场了，文化革命派上用场了。）造反派不会那么快就跑到老乡家去抓他，顺藤摸瓜也不会那么快。反正就这家住住，那家住住。他的信息是有的，他们商量好了，把信寄到谁家去，我妈会定时到谁家去取信。直到工宣队进驻，工宣队是抑制打砸抢，抑制武斗的。我妈写信说，工宣队进来了，不会随便再打人了，你就回来吧。他就回来了。回来以后主要是烧锅炉和扫文联的胡同。他们这些人——西、李、马、胡、孙，除了扫大街就是轮流去烧锅炉。整个作协的供暖，就是几个老作家在那里烧，轮流烧。

徐：那据你所知，你父亲有没有怨言？他当时乐意干这种工作吗？

邢：他当然不乐意了。我父亲性格很倔强，在家是什么活都不干的人，他哪儿受得了这个？当然，让他扫地，总比之前马烽他们受到的屈辱和批斗要好一些。比如：在湖滨会堂，批斗赵树理，那是万人大会堂，将三张桌子摆起来，让60多岁的老头站在上去。不知道什么人把桌子一踹，老头从三个桌子上摔到地下，摔断了三根肋骨。从此得了肺气肿和肋膜炎，一直到死赵树理都没有躺下睡过觉，因为躺下，他觉得胸堵得难受。赵树理和我们家是邻居，我们去看他时，知道他每天都是在炉子边坐着睡觉，可惨了。他去看病，人家知道他是大黑帮，不敢给他看。老头最后死得挺惨，这么受人爱戴的作家！

徐：想起来，真是令人发指的。因为赵树理太受群众拥戴，是属于群众的作家，革命的作家。

邢：都说是人民作家。写的也都是大家耳闻目睹非常熟悉的民间百姓事。（徐：而且是艺术成就非常高。我从小就看他作品，《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说他是语言大师。）让人很难过的。他去世时，我们已经去插队了，不知道具体情况。我跟他儿子在一个村插队。

徐：你父亲的待遇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邢：有些事也躲不过去。那时候，各路造反派，你来我去，已经抄了我们家几次。我家基本上没什么书了，说这是封建主义的，那是修正主义的，拿床单兜着，都拉走了。也不登记，不像北京有些单位还返还什么，什么都没有。有一天，我父亲刚躲出去的一个夜晚，造反派又来抄家，还牵着狼狗，带着大口罩。当时我母亲怕造反派向她要我父亲，也躲出去了。家里只有我们姐妹六个人，他们非要让我们开门不可。我们不开，大声叫喊。赵二湖从他们家的小门翻墙过来，对抄家的说：人家家里都是女孩子，你们最好避避嫌，你们要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别这个样子。那些人也觉得不合适，哪有带着大口罩去抄家的？就乱哄哄地走了。我们感谢二湖相助，二湖说，我爸爸听到你们这边动静很大，叫我过来看看。赵树理伯伯病殃殃的，还保护着我们，我心里一直感激着他，后来还写过一篇文章纪念他。

徐：赵树理真是个好人，这个故事听起来让人唏嘘。刚才你还提到一个人，我觉得这些网友还是需要知道的。你提到李英儒，有点意外。他是一个正面人物，是给中央文革小组做事，还有点负责任的人。他让你父亲到北京来，其实是保护他，成了你父亲的保护伞。我也是从小看李英儒的作品，最有名的是《野火春风斗古城》，那真是脍炙人口，出书的时候可以用洛阳纸贵来形容。这个人的故事也值得讲一讲。我知道他命运也挺复杂、挺坎坷的，他在保护你父亲的那个阶段，至少表面地位非常高，很正面，在中央文革手下干事的一个人，后来也倒霉了。他是怎么回事呢？

邢：文革以后李英儒夫妇到山西来，当时我还在山西工作。李英儒见到我说，走，跟我上趟五台山。我就陪他们去了。一路上他给我讲，他蹲了八年的秦城监狱。（徐：他怎么掉下来的？）我就问他这个问题。他说，有一天中央文革文艺组收到了一个绝密的大纸袋子，当时金敬迈是组长，金打开一看，是上海的某个图书馆，把江青在二三十年代的有关照片、刊物汇到一起密封了，给他们送了来，因为他们已经属于中国文艺界最高领导了。

（徐：中共文革小组下面的文艺组）金敬迈害怕得不行，自己看了几眼，合起来，谁也没给看，就送给了周恩来。周恩来说，我就不看了，请交给江青同志。（徐：这多微妙啊。）江青一看，就认为你们这些人都知道了我的情况！其实李英儒坐了8年监狱，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弄进了监狱。金敬迈后来写了一本书叫《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说把他和李英儒都投进了秦城监狱。其他人什么下落，我就知道了。李英儒告诉我，他个子很高，关在特别窄的一个小屋，一个人躺下就满了，什么都没有，单独关着他，也不能跟别人说话，什么也不能做。他说，这种情况很容易把人逼疯，或是失语。我说，那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说我当时就在那么小的一点范围里跑步，天天让自己跑上千圈；我怕脑子坏掉，就写诗，在肚子里写。他说我知道这事是江青干的，是她把我送进来的，但是为什么，我就知道了。他说，我天天写骂江青的诗，写完了就背诵，默记在心。老动脑筋在那儿创作，创作诗和其他东西。直到林彪事件发生以后，释放了战犯，他们待遇才好些，允许送《资本论》一类的书，他就让家里给他送。从那时候开始，他用紫药水，用牙膏皮，重新创作。他常说，这儿破了，那儿破了，要点紫药水。在监狱里，他写了两部长篇小说，一是《还我山河》，一是《女游击队队长》。他很顽强，很有毅力，从报纸或者是其他地方这撕一点，那撕一条，趁人不注意，写了一堆东西。后来把这些纸条，还有写过字的书，在家属探亲的时候夹在脏衣服里，带出去，直到释放。好长一段时间，他是在没有人的情况下，跟李锐似的，用紫药水写作。李锐不是在那里写的《龙胆紫集》吗？作家嘛，还想着写小说，还想调动自己的生活经历来写一些革命故事，和自己想写的人物，英雄人物。

徐：李英儒的遭遇也是够悲惨的，听他的故事也是非常的令人感慨。而且这也说明中国的政治是非常可怕的，今天座上宾，明日阶下囚。（邢：对。）红的时候炙手可热，一旦倒霉，就过上人不如鬼的日子，真是很可怕。后来你父亲，根据自己和一些好朋友、老作家的遭遇，有没有感悟啊？这方面，他对自己的经历跟遭遇，是怎么看的呢？

邢：怎么说呢，其实他对整个文化大革命是很有看法的。他当然不能明说。文革以后不是出现了伤痕文学？他注意戏剧，包括《于无声处》这样的话剧，这些话剧对文革当中的一些事件和所谓的路线都有思考。对此他是很拥护的，也写文章称赞这些作品。当时河北有一个作家叫李剑，写过一篇文章叫《歌德与缺德》，说伤痕文学属于“缺德”类的文学。我父亲还写文章反驳李剑的看法。至于你让他公开提出对文革的看法，对体制的看法，他没有跟我们明说，他比较沉默。

徐：文化革命结束以后，社会生活比较正常，你父亲又恢复他的创作没有？他后期有没有另外的作品出现呢。

邢：他写过。在文化革命后期，1972、73年他就解放了。政治问题解决了以后，他要求调到河北，他说河北是我的创作基地，我还是回去吧。调到河北保定，粉碎四人帮后他写过《古城十月》，还写过《雁荡儿女》。（徐：是正式出版的？）没有。《古城十月》上演了，《雁荡儿女》就是写白洋淀一带的革命故事。（徐：都是基于他的生活。）他写这样的作品得心应手。你让他写现代生活，他不太熟悉。他写游击队啊，老百姓啊，军民鱼水情啊，可能拿手。

徐：新时期以后，这些东西也不受关注。

邢：对。后来当创作方面转向更加自我，很多作家在形式上的探索比较新潮，他就进入不到这样的创作氛围当中了。

徐：你父亲的故事其实还是说明了很多问题。最后，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作为一个教文学课的大学教授，你的学生知不知道中国文学史上有这么一段很悲惨的日子？中国这些最著名的，倍受尊崇的作家，他们的遭遇，以及他们作品的遭遇，你觉得他们不了解这些情况呢？

邢：基本上不了解。我是比较早地走上讲坛的，我给77级都上过课。八十年代思想解放，很多新锐的作品为77级、78级的学生所关注，而老的那一代什么游击队，战争，大家不是很感兴趣。所谓的红色经典已经过时。77、78、79级那些学生是看着那些书长大的，他们还有点熟悉，不太陌生。到后来80年代的学生，更不了解这些东西了。如果你特意地把这些作家拿出来讲，我觉得他们听不进去了。所以我没有在课堂上讲过父亲的遭遇。

□ 原载：公众号《影响力发现》

~~~~~  
【亲历者言】

我在清华参加文化革命

• 胡宗华 •

〔编者注：胡宗华，1945年生，天津市人。1964年考入清华大学工化系。因病失明后，他对家人口述了文革中的一些事情。2009年秋不幸去世。本文由胡宗华口述，嘉仁根据2009年春的录音整理。〕

1966年6月2日，我像往常一样，到食堂买了个馒头，就赶快往教室走，想放下书包，去念外语。这时，学校的广播大喇叭响起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广播了北京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顿时整个学校就沸腾起来，都不上课了，全部涌向北大。此时，北大的校园里人都满了。当时的气氛，使我明显地感到，这是中央鼓动学生炮轰党委。炮轰党委、炮轰领导是当时运动的主潮流。清华的学生一回到学校，都拿起笔来写大字报，讨论蒋南翔姓马还是姓修，形成了两派意见。主张校党委姓马的人，多是学校的各级领导、政治辅导员、班主任。主张校党委姓修的人，绝大多数是青年学生。他们虽然主张校党委姓修，却也拿不出有分量的例子。文革前，北京市各个高校，对“三家村”批判的做法，都差不多，是上面布置下来的，总的调子都一样。当时，清华刚刚开完了万人大会，蒋南翔在会上讲：大炼钢铁的时候，有人主张把图书馆的大铁门拆下来去炼钢，被我们给制止了。我们不能跟着风跑，我们要跟着毛泽东思想，要开万人顶风船。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你们党委是正确的，也就没有必要开万人顶风船。如果开万人顶风船，这个风也就够大的了。这个风从哪里来？也就可想而知。这么一分析，反而引起群众对蒋南翔的怀疑。到了6月11号，张际春到教育部宣布蒋南翔停职检查，清华党委也就是姓修的了。

大哥当时在北大物理系，6月4日从沙河供销社四清工作队回来。大哥给我讲了一些情况。我的思想是站在反校党委这边的。可是一个大二的学生，学校里面的事又知道多少呢？我也就没有写大字报。6月11日，蒋南翔倒台以后，学校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斗黑帮的高

潮。好像全体清华学生就学过一篇毛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真的要戴高帽、要游街。当时保党委最积极的人，现在成了反党委最积极的。像我们班的两个人，说是自己贫农出身，那时对党委感情有多深，现在又说感情受到欺骗。斗班主任的时候，拿着教室里的字纸篓就给老师扣下去。

全校到处是斗黑帮的声音，从小小的年级主任、班主任、政治辅导员，到政治课的全体教员，到校党委的全体成员，到各个处室的头头，都成了黑帮。满街都是戴高帽的黑帮。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思想发生了动摇。整个清华大学8000学生，10000名教职工，合计1万8千人，当时被揪出的有1000—2000人。如果这些人都是黑帮，都打倒了，将来清华的干部从哪里调？没有一个地方能调2000干部充实清华，我感到很迷惑。但在那种情况下也不敢表露，我只敢把我的思想告诉我们班的一个高干子弟，他叫王太行，他的父亲是中国的工程兵副司令，叫王耀南，是安源煤矿的老工人，红军第一任工兵连的连长，这在毛选里都有记载。

蒋南翔倒台没有几天，中央派了以经委副主任叶林为首，大约一两千人的工作组进入清华。他们进入清华以后，完全按照党政机关的工作方式，把学生叫到教室，统一学习，发言表态，批斗黑帮，一切按照他们的指示办事，以为这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斗资本主义黑线。他们忘记了起码的一点，青年学生对已打倒的黑帮是不感兴趣的。打死老虎的人决不是武松，只有打活老虎的人才是武松。你把学生整天箍在教室里煞有其事地开会，外面那么热闹，学生的屁股能坐得住吗？于是，工作组和学生之间就产生了矛盾。

我们工化系的情况比较特殊，这牵扯到工化系工作组的组成。工化系的工作组组长叫张茜薇，合成化工研究所的书记，张茜薇是广州起义张太雷的女儿。文化革命开始了，急于创造经验的刘少奇，派王光美到了清华，也进入工化系。王光美以小何名义进入工化系。当时工化系蒯大富在902班，他们班有32个人，有17个人支持蒯大富。那时候王光美跟那个班有个约会，结果王光美失约了，没有去，把学生给凉场了，学生对小何这个工作组成员就有意见。6月21日贴出了题为“叶林同志，这是为什么？”的大字报。这个大字报贴出以后，就赶上了6月24号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党的阳光照亮了文化大革命的道路”的社论，其中最后的一句话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亮了文化大革命的道路，任何魑魅魍魉都不能躲藏。我一个青年学生对社论理解得很肤浅，没有看出要干什么，就是说了几句普通的大实话，没有看到是刘少奇对学生动手的进军号。当天晚上清华就发生了著名的6·24大辩论。蒯大富为首的一批学生和工作组就清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问题展开辩论，辩论到很晚，十点多钟了。当时我们工化系的学生都住在新斋，我们化0住在新斋的东头，蒯大富住在二楼，是在后面的一排。我当时的思想偏向于蒯大富，但是没有发表任何的言论，我只是在当天的晚上到蒯大富的宿舍找了蒯大富，问了一些事。我也不知道怎么的，我找蒯大富这个事被班里的人知道了。6月25号开始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了清华校园，坚决揪出反革命分子蒯大富。全校各个班都在揪反革命。当时我们班一查，只有我在那天晚上见了蒯大富，所以班里也把我当成重点对象。到处调查我那些日子干了什么，还停止了我参加一切活动的权利。他们在那里要撰写打倒反动学生胡宗华的大字报。我没事可干，怎么办呢，整天拿着游泳裤头去游泳。

班里还开了我两次批判会。在文化革命未开始的时候，聊天时我说西哈努克到中国来，见周恩来，送给他三十万美金。周恩来送美金，是中国政府送的。批判我的时候，说我说的私人送的三十万美金。党的领导谁能有三十万美金，这是污蔑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这股批判风一直刮到7月底，一个多月，清华大约有千名学生和教师被打成反革命，其中自杀死亡的大概有七、八个人。比如体育教研室的教师康有为的孙子两口子撇下两个孩子跑到荒岛上上吊自杀（整理者注：清华大学“文革”时期非正常死亡名单中没有此事。）。还有自控



系的一个年轻老师，跑到十三陵山洞里喝敌敌畏死了。这就是当时工作组在清华创造的丰功伟绩呀。

7月27号我去北大，见到26号中央文革到北大的讲话，我发现中央文革的调子和那几天人民日报的调子明显不一样。我中午回来的时候路过第一员工食堂，发现一些学生围着一个小屋要见王光美。窗户开了，王光美对学生们发表了讲话。我只记住了一句话：“王光美是不是革命的，你们可以考验嘛”。这句话，我听完了以后，总觉得很别扭，怎么叫王光美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叫学生考验呢？当时的学生还没有讨论你是不是革命的，还把你当成国家主席的夫人，聚集到窗户跟前，想看你。你王光美讲这个话，这不是和批评你的人公开对抗吗？7月28号，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的时候，你却要突然离开清华，这走的这时间实在是不对，一定是有什么问题。第二天，在人大礼堂召开的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中央的领导人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都发表讲话，其中刘少奇说中央犯了错误，向各校派了工作组，把革命学生打成反革命，都是错误的。从那以后，工作组就蔫蔫嘎嘎地撤出了清华。

8月4号，清华大学召开万人大会，还有一些学生不识时务地上台发言，为工作组鸣冤叫屈，不过主要的矛头还是针对蒯大富，蒯大富到底是不是反革命。当时没有一个人敢说蒯大富不是反革命，只有蒯大富自己上台为自己辩解。最后周恩来一锤定音：两派的材料我都看过了，我现在可以负责地说，蒯大富不是反革命。8月4日大会上周恩来这句话解脱了蒯大富。那时说蒯大富要夺权的主要依据是蒯大富在刘泉的大字报上有这么一个批语（大意）：工作组在清华的所作所为是不是代表了我们的意思，代表了我们就跟他走，不代表了我们再次革命。

8月8号那天，广播了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就是十六条。8月十几号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在清华贴也出来了。当时学生知道中央有问题，但是也没敢贴大字报。清华有两个学生，一个叫唐伟，一个叫陈育延，约是19日，他们到了中宣部，找了中宣部国际处的处长阮铭，他过去是清华大学的团委书记。阮铭告诉他们，中央出问题了。毛主席的大字报明显的是点的刘少奇，而且语调是非常犀利：我们有些同志在二十多天里，反其道而行之，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用心何其毒也。毛主席在大字报里用了这样的词，说明毛主席对刘少奇是恨透了。所以这两个学生回来以后，在清华园里贴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由王光美联系到刘少奇。只要有人敢挑头，那整个清华园里铺天盖地全是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和尚的金刚经精华版本。批判王光美（小何）在清华指导文化大革命，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当时在北京的所有高校当中，只有清华的学生贴了刘少奇的大字报。当时清华大学那么大的校园，到处是人山人海，来看刘少奇的大字报。8月24号，首都中学红卫兵进了清华，把清华大字报撕个尽光，他们要誓死保卫刘少奇。这个时候中央文革陈伯达也出来讲话，贴刘少奇大字报是错误的，应该制止。在这种情况下，清华的大字报的风波就过去了，这是清华文革史上最热闹的一段时间。

聂元梓等人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跟五一六通知是一个调子，不超出五一六通知。现在看来，这张大字报对全国造成了不良影响，聂元梓应当负一定责任，但主要责任应该是中共中央来负，是毛泽东来负。你们发了中央文件，出了错了，让底下执行的人来承担责任，这不是胡闹吗？1967年的2月份，几位副总理在怀仁堂开会的时候，大闹怀仁堂，被称作二月逆流。对待二月逆流的态度，北京市高校的红卫兵就分成两派。北师大派和北大派，后来就叫地派、天派。它波及的面很广，不只是高校。谭厚兰等提的口号是打倒谭震林，打倒余秋里，打倒谷牧，打倒陈毅，揪他们的后台。大伙都知道怀仁堂出事了，具体谁讲了什么，谁也不清楚。中央也没有把这些东西泄露出来，明摆着死保这些副总理是不可能

的，在口号上做些文章，你要打倒，我就提出火烧（指是人民内部矛盾，批判一下），火烧谭震林（后来提打倒），火烧余秋里，火烧谷牧，火烧陈毅，明显地可以看出北京的高校分成了中央文革派和政府派。以北大为首的一派，是保总理的，属政府派。北大的这种做法，本质上是和毛泽东顶着干的，虽然当时聂元梓也没有意识到，但是她就是要保卫政府，这一点上聂元梓还是干得很漂亮的。

我是从66年的8月底出去串连了。回来后，赶上蒯大富创建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因为和蒯大富接触多次，我和王太行一起参加了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并参加了核心部队28团。这期间，我带上清华井冈山的袖标，到东北去串联。回到北京，赶上一月夺权。我在井冈山总部，听清华井冈山派到高教部夺权的人讲，在高教部北大和北师大的人发生了冲突，双方各支持一派，清华闹的也不好表态。我见到了蒯大富，蒯大富正在考虑这个事，他说：胡宗华，你去高教部，把这个事处理一下吧。第二天我就到了高教部。参加夺权的单位很多，北京的，外地的。成立了夺权委员会，清华大学井冈山是头头。清华自己的人对于支持谁，也是分成两派。我是代表蒯大富去的，自然成为清华在高教部夺权的负责人。

高教部当时主要是两派组织，一派是北京公社，北京公社的头头参加过北大的四清，叫陆善功，和聂元梓有过战斗友谊，所以，北大就支持北京公社。另外一派叫延安公社，头头叫卢正义，因为5月26日贴出了高教部的第一张大字报，所以成了响当当的造反派。卢正义解放前在上海被捕，押到了江苏反省院，在反省院里面，写了很多肉麻的吹捧蒋介石的诗。在他的档案里写的是有变节行为，没有定为叛徒，组织结论定为变节行为，实际上就是叛徒，这是大伙儿都知道的。而且这个组织里面还有另外两个人也有叛徒行为。一个小小的组织，那么多叛徒，我当时就很反感。可是再一看延安公社后面有学部红卫兵（吴传启）的支持，有北师大谭厚兰的支持，特别是有《红旗》林杰、中央文革关锋的支持，根子相当的硬，绝不是清华大学拿了一个高教部夺权委员会头头的章就能领导得了的。一天晚上，清华学生自己研究怎么办。我说算了吧，我们不去搅混水了。要让我支持北京公社，但我明显知道延安公社后面有中央文革后台，你是惹不起那样一拨人的。你要是支持延安公社的话，支持一大窝子叛徒当权的组织，我心里实在不甘心，干脆咱们退出去。半夜了，清华大学发表声明退出高教部的夺权委员会，不再掺和了。大多数人就撤回了清华，我在高教部留了一间办公室，就是清华夺权委员会的那间办公室，这样我进城就有个落脚的地方。

清华撤出后不久，北大和师大公开冲突。想不到的是，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从后台走到前台，几次打电话批评聂元梓和孙蓬一，北大的队伍只能撤出高教部。

离开教育部以后，我到一些学校和机关走走，了解社会发生的事情。详细了解统战部115抢档案事件，不过，那个把抢档案的洪涛说成左派的公安部某负责人讲话，没有搞清楚它的来龙去脉。115事件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大哥在2月6日就到民族学院调查，他的态度是明确的，反对抢档案的。我们之间没有联系，但是看法是一致的。聂元梓和孙蓬一的态度也是明确的。孙蓬一在4月13日大会上讲：把保护档案的人抓起来，把抢档案的人说成左派，这是什么逻辑！孙蓬一还讲了谢富治的许多事，引发炮打谢富治事件。

为档案事件民族学院两派争论得厉害，还发生武斗。总部红卫兵在事发现场是阻止抢档案的，还把洪涛等人抓到公安部。一个公安部某负责人谈话，把他们说成错的，能服气吗？挑动群众斗群众，就是你谢富治嘛！二月底的一天我到民族学院，赶上两派辩论。两派（总部红卫兵即后来的抗大公社；造反红卫兵即后来的东方红公社）各坐在礼堂的一边，约定每人发言20分钟，轮流上台。武斗时（只是身体接触）闻到一股气味，不知从何而来。有人请来高人说是亚硫酸，民族学院的学生也不知道亚硫酸是何物。造反红卫兵的人说是总部的人放毒气。但又解释不了，为什么毒气只毒造反红卫兵，不毒总部红卫兵。我找到造反红卫

兵的领导人韦青峰说：我是清华井冈山28团的，是学化学的，我上台说说毒气。他没有问我支持那一派，就让我占他们的发言时间上台了。我先亮明身份，然后说，你们见过街上卖馒头的吧，为了使馒头表面发白，好卖。蒸馒头时候，在锅底放一个碗，碗里放一块硫磺，硫磺受热变成气体，对馒头有漂白作用，这就是亚硫酸，不是什么毒气。话锋一转，说：造反红卫兵在高教部和大叛徒卢正义坐在一条板凳上。在人民烈士纪念碑前，面对无数革命先烈，你们不感到羞愧吗！这时场下大乱，总部一方拼命给我鼓掌，造反红卫兵上来几个人，把我扭下台，塞进一辆小车，说是押我去公安部。出了校门，不是往南（去公安部），而是往北，走了不远，把我扔到路边。因为我亮的牌子是清华井冈山28团。从此民族学院总部红卫兵（后来的抗大公社）和清华井冈山的关系很好。我本人和总部红卫兵的头头郑仲兵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不管我是在井冈山兵团还是在414。

4月11日，地质学院等6所学校，一块到北大闹事，说聂元梓无权进入市革委会，新北大公社是老保等等。清华井冈山一个总部委员来到北大。你来了在一边看着就行了呗，他非得表态，支持地质，反对北大，这不是找挨揍吗？蒯大富也欠思量，对当时北京高校的形势错误地判断，井冈山总部发表声明谴责北大，这样和北大的关系闹僵了。

414当时刚成立的时候，是地质学院鼓动成立起来的，地质学院为了分裂清华井冈山，催生了414。这一棒子，使得蒯大富略微清醒了些。这时北大带领一些单位开展向学部的吴传启的斗争，就是向中央文革的关锋的基层势力的进攻。蒯大富摸不清头脑，又不好意思直接找聂元梓，就托民族学院的人代为说情，和北大搞好关系。从而参加反吴传启的斗争。反吴传启的斗争是惊心动魄的，政治风险极高的。它反对的是关锋、王力，是中央文革的少壮派，是毛泽东的得力干将，实际上是反对毛泽东。

1967年4月10日，聂元梓和孙蓬一到钓鱼台见江青和陈伯达（戚本禹在座）说王力、关锋“结党营私”。从那一刻起，在毛看来，聂元梓是不可信任的了，注定今后聂元梓不会好的结果。1970年开始的清查5·16运动，中央把王力、关锋、戚本禹、陈伯达都划入5·16的后台。尽管在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接见五大领袖时，对聂元梓讲了：“你反王关戚是对的，反得好！”毛泽东的御林军8341还是给聂元梓、孙蓬一扣上5·16分子的帽子。

在教育部期间，利用我是清华井冈山驻高教部负责人的身份，见了三四次蒋南翔，谈了很长时间。同时把蒋南翔写给中央的所有材料的副本都要到手了。另外我也找了教育部的副部长高沂，他原来是清华大学副校长。在高沂家，我第一次听到党的高级干部对一个自己不熟悉的人表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高沂跟我说，我们是黑帮？一开始的时候，孩子们到处喊打倒黑帮，后来我成了黑帮了，孩子们见了我们，连话都不说了。再过几天，他妈妈也成了黑帮了，孩子们给我们相面，说爸爸像黑帮还是妈妈像黑帮？谁都不像黑帮。高沂的老婆说：我们不是黑帮，我们将来死了，我们还要进八宝山公墓，是革命公墓，不是普通公墓，这段历史让党给我们写成红色的。

我拿着蒋南翔的材料回到清华，给王太行看了材料。我们找到了刘冰，刘冰是清华大学党委的第一副书记。我就问：刘冰，你对蒋南翔是什么评价？刘冰说，仅就蒋南翔在清华的工作，蒋南翔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在社会和中央的事情，他和彭真有什么关系，站在哪个立场上，这是我们不了解的。我说：如果我把蒋南翔写给中央的材料，拿给你们看，你能不能得到结论？他说我能得出结论。我就把蒋南翔写给中央的那些材料拿给他看。看后，刘冰说，看了蒋南翔的材料，和我们过去知道的基本上是一致的。如果这些材料是属实的，那么蒋南翔不是黑帮。

王太行办过一件大事。当时全国有一幅画：一九二二年秋毛主席去安源。北京美术学院画完以后，写的是一九二一年秋毛委员去安源。有人说是1921年秋，有人说是1922年秋。可是当时从安源出来的人，只剩了两个人，一个是王耀南，一个是外交部的副部长耿飚，还有一个记不清了。后两个人，各说一词。后来通过王太行找到他父亲王耀南，他说是1922年秋：“为什么说是1922年，那年我八岁，大伙说毛委员来了，都挤着去看毛委员。我个子小挤不进去，爬到树上，结果从树上摔下来，把腿摔断了，所以我记得清楚。”画的作者说：你说的和别人不一样。王耀南说：那么咱打个电话给主席。王耀南家里有个红线机子，直接把电话打到中南海。当时是江青接的电话，江青说：这个事我也说不好，我问问主席吧。主席接了电话，回答说是22年去的安源。于是这幅画变成“一九二二年秋毛委员去安源”。

王太行对校党委的看法和我一样。他看到我带去的那些材料后，我们商量写了份大字报，对校党委应当重新评价，实际这大字报就是给蒋南翔翻案。王太行说大字报写好了先不贴。我放在窗台上，让我们班左派发现了，给修正主义校党委翻案的大帽子就扣上了。把状告到蒯大富那儿去了，结果，蒯大富就把我和王太行从团派里给开除了。我们从此离开了团派，就当了一段逍遥派，实际上，我是有更多的时间到处看看。

那时候有一个口号：“今天的左派，要在过去的反革命堆里去找。”团派的红教联，在北京的红卫医院（精神病院）找到了响当当的左派叫陈里宁，并把陈里宁的一部分日记，编成了“新狂人日记”。那时谢富治在清华的几次讲话都表示坚决地支持红教联，坚决地支持陈里宁，没想到陈里宁真有问题，连中央文革都看不过去了，下令把陈里宁重新关进红卫医院。红教联也就垮了，414抓到一根大木头。

1967年7月20日出了个重大的事件——武汉的七二〇事件。事件以后，人民日报的通栏标题就出现了打倒带枪的刘邓的口号。在八一建军节，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狠抓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抓军内一小撮在516通知里就有这句话：“混进党内、军内、政府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把它单独作为一个口号提出来，是八一社论。这时候我回到了天津，见到了我高中的老校长李彤。他一见到我，就说：回天津干什么来了？我说放暑假回家休息。他说：你回家休息可以，不要去抓军内一小撮。我说：您这个话我听了有点别扭，和当前报纸上的社论不相符。他说：听我的。我在天津呆了一个月，到了9月1日报纸调子就变了，不抓军内一小撮了，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我又找到李彤。我说李校长，现在报纸上社论好像变调子了，你看怎么回事？李校长说：怎么回事，原来说错了嘛！出问题了嘛。我说：李校长，我上次来的时候，是8月初，中央刚刚发表社论，你就敢跟中央社论唱反调。你怎么知道那一篇社论有问题？李彤说：这是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基本原理，支撑这个国家的靠什么呢？靠的是军队，有了军队国家才能挺得住，支撑得住。没有军队，国家一切都完了。我当校长，过去的时候，我说一句话，公安局来人，把学生带走。因为那时公安局是支持我的，军队是支持我的。现在呢，你们学生给公安局打个电话，公安局来人把我带走。为什么呢？公安局和军队支持你们学生而不支持我。我怕你们学生吗？学生有什么好怕的，我是怕你们后面的后台。

9月份，我回到北京，气氛都变了，中央文革把王力、关锋，还有红旗杂志社的林杰作为反党集团，把他们抓起来了。414里有我过去清华体育代表队的老朋友赵梦林等，他们在一月夺权时参加光明日报夺权的，遇到了高教部同样的问题，也是北大和北师大打得不亦乐乎。这几个人经自己的独立思考，认为北大是对的，师大是不对的。414通过赵梦林，把我搞到了414。在414里成立了一个战斗组，叫九七战团，就是揪威本禹和谢富治的战团。在1968年春天高校学习班时期，清华414“九七战团”，写了一篇长篇文章“王、关、戚反党集团和公安部某负责人在清华大学都干了些什么？”副标题叫50个为什

么？就是把谢富治他们在清华的讲话都列出来，好好的批一顿。谢富治为这个事专门有一个讲话。

王力、关锋倒台在4 1 4内部引起不小的震动，在反思，跟着地派究竟为什么？在高校学习班清华4 1 4站在北大聂元梓一边，介入批判谢富治，社会上戏称4 1 4为“变天派”，不太好听。但是这一次“反谢”被中央文革扣上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帽子压下去了。

在学校学生们没有什么事情可干，一些口头禅出现了：“天天难过天天过，日日无聊日日聊”，“写不完的检查，请不完的罪，受不完的蒙蔽站不完的队”，“逍遥派真不赖，不搞武斗不搞派，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表态我表态”。可以看出广大学生对文化革命已经很反感了。学生都有阅读历史书籍的能力，在6 7年8—9月份，知道了陈伯达是叛徒，张春桥是叛徒，张春桥在上海化名叫迪克，专门和鲁迅干仗，鲁迅写了许多反迪克的文章。另外，江青的历史也有所耳闻，大伙当时就知道，江青的原名叫李兰萍，在上海演过“王老五”，电影插曲：“王老五，王老五，说你命苦真命苦，白白活了三十五，衣裳破了没人补”。对李兰萍三次入党，三次脱党这件事大伙一直没有闹清楚。

各个学校相继转入武斗状态，大多数学生也就回家了，我也回家了。首都工宣队进入清华最初的目的是制止武斗，这点上是应该深得人心的，但后来的发展非常令人憎恶。不说别的，清华整个武斗过程中，死了大概三四个人，在王光美的工作组进入清华的时候，全校加起来也不过死了十个人，而工宣队进入清华以后，在短短的一两个月里头，清华自杀的有三四十。比如我们工化系当时党总支有五个委员，上午看到了打倒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黄志冲，下午的时候，传达了黄志冲昨天晚上上吊自杀了；又来了打倒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曹小文，曹小文死了（整理者注：清华大学“文革”时期非正常死亡名单中没有）；又过了几天，打倒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李文才，李文才死了。我们系总支共五个委员，当时就死了三个。其他各个系总支委员和校级领导机关的领导干部也基本是这个情况。为什么工宣队进校以后会出现大批死人的问题呢？工宣队没有进校以前，学生们斗走资派，你再喊打倒走资派，他们知道你喊的没有用，最后各级党委作结论，本人签字才管事。可是工宣队进清华以后就不一样了，他们成立了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清华大学党委。毛主席又是接见，又是送芒果，毛泽东就亲自讲，他们是我派去的，揪黑手的话就揪我，这就已经是顶了天了。毛泽东如果把这些干部说成是走资派，那这些干部就都定性了，无翻身之日了。所以一些高级干部，一些教授就纷纷自杀了。

那个时候，工宣队处处代表着工人阶级领导，不许说一个不字，说一个不字，就要受到批判。可是学生们永远是思想最活跃的一帮人，要想禁锢他们的思想那是办不到的。毛泽东发表了一个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指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要有工人阶级再教育改变他们的思想，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是有作为的。大伙在那学习，学习学习就不知道学哪儿去了。什么叫“旧学校”？所有的文化革命以前的学校都叫旧学校，文化革命以后也没建新学校。什么叫知识分子呢，首当其冲的就是大学生，你们这些大学生有知识的都属于知识分子。毛泽东属于不属于知识分子？毛泽东是师范毕业，相当于现在的高中，毛泽东当然是知识分子了。毛泽东写的那些诗词，大学教授也写不出来。这就是说高中毕业的也应该算知识分子了。那朱德算不算知识分子呢，朱德小学毕业，贫农的孩子，朱德的诗“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注：经网上核对，诗句是叶剑英的），气魄得很，朱德的一些文章是相当不错的，朱德也应该是知识分子。那就是说小学毕业的也应该算知识分子。文化革命以前在学校读书的，小学毕业以上的都算知识分子，这样就把整个的工宣队都给套进去了。工宣队员也算知识分子，也要由工人阶级给工宣队员再教育。讨论了半天，讨论到工宣队头上去了。工宣队就发火了，我们进了工厂，当了好几年工人了，结果还是知识分子，还要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我们的再教育不就失败了吗！最后由迟群出来打了个圆场：我们所

说的再教育是一个再学习再改造的过程，所有的人都应当有再学习再教育的过程，知识分子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同样的，工农兵，工人阶级，解放军接受红卫兵小将的再教育。讨论了一个多月，就讨论出这么一句话来。

清华工宣队迟群这些人很善于总结经验，今天写一份报上去，作为中央文件发下来，全国遵照执行。明天写一份报上去，作为中央文件发下，全国遵照执行。为了表彰清华工宣队的所作所为，毛泽东专门发表了一条指示“善于总结经验”，全文我也忘了。让学生们讨论，总结经验。哪有那么多经验好总结的？结果，学生们弄了个：如何写思想总结，各种大会上发言的精彩片段摘录下来，出了个小册子《总结，总结性的语言》：大便不臭，臭的是思想；这一跤摔的好，摔出小资产阶级的我来。此类的话编了一本书，全校发。总结经验这个东西就这样不了了之。工宣队看着学生们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可唠叨的了，就把老师们弄到江西鲤鱼洲的农场，把学生们轰到北京市的几大工厂，名义是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清华大学就没有人了，直到1970年初，我们毕业分配。

~~~~~

【亡灵祭坛】

红歌背后的哀歌

• 赵越胜 •

问：赵先生，在你新出版的《燃灯者》（增补版）一书中，有一篇文章，谈文革中惨死的女钢琴家顾圣婴。我们知道，她是中国最有天才的音乐家，却在文革中受到残酷的侮辱迫害，最后和母亲弟弟一起自杀。今天请你给听友们谈谈她好吗？

答：这个话题可不轻松。我写那篇文章时，几次掷笔叹息。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周广仁先生专门托人给我带话，说我能写顾圣婴，她非常感谢。她们是同一代音乐家，有很深厚的感情，对顾的惨死非常痛心。文革中像顾圣婴这样的英才不知冤死了多少。所以我看到那些在海外还要唱红歌歌颂毛的人，就想问他们：你们还有一丝人性和良心吗？怎么能明知无数同胞惨死于毛发动的文革却无动于衷，反而要去歌颂刽子手？

问：现在中共红色文化输出的势头越来越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去抹杀那些罪行。

答：你说得太对了。只要有良心的人记住那些罪行，红色文化就全无蛊惑人心的力量。所以我们谈文革，就是为了保留民族的记忆。也就是为中华民族真正的复兴，为它终能走入文明国家行列而存一火种。好，不扯远了，我们来谈顾圣婴。顾生于一个文化书香源远流长的家族。她的远祖顾雍是三国时吴国的丞相，史称“魏晋八君子”。他是汉末大音乐家蔡邕的学生，曾追随蔡邕学琴，极通音律。所以顾圣婴的音乐天赋其来有自。顾家与傅雷先生是通家之好。傅雷先生曾亲自为傅聪和顾圣婴编写文化课本，让他们学习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这些好东西在中共教育体制内是学不到的。顾圣婴的父亲顾高地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却帮助过中共特务头子潘汉年。我们知道，潘汉年是当年中共勾结日伪，向日本侵略者传送抗战军情报的负责人。中共夺权后，必须要掩盖这段卖国汉奸史，所以潘汉年就成了替罪羊，被捕入狱。这就牵连到当年帮助过潘的顾高地先生。顾先生最爱这个极富天才的女儿，从顾圣婴五岁起，就带着她学习音乐，广拜名师。结果小圣婴不负众望，被上海交响乐团录取为独奏员，那时她年仅十七岁。正在顾圣婴的艺术生涯辉煌开始的时刻，她所敬爱的父亲却在家中当着她的面，被人抓走了。这对顾圣婴打击太大了。不仅痛失慈父，还因此成了

“杀关管子女”。在那个出身能决定命运的时代，顾圣婴的成长面临巨大的障碍。幸亏当时顾身边有许多爱才又富同情心的师长，他们默默地保护着顾圣婴，送她到北京，跟随苏联专家克拉夫琴科学习。1958年，顾在克拉夫琴科的指导下，参加了日内瓦国际钢琴比赛，成绩优异，得了最高奖。与她并列这个奖项的，是波利尼， he 现在是世界上顶尖的大钢琴家。而且人称“钢琴女大祭司”的阿格里奇也是这个奖的得主，只是比顾圣婴早了一年。从这里，你就能看出顾的钢琴演奏已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若正常发展下去，她会成为世界级的钢琴演奏家。

问：她的中途夭折，实在太可惜了。我记得傅聪就是在58年逃到英国的。

答：对，傅聪和顾圣婴曾在一起学琴，两个人很熟。傅聪是55年获得肖邦钢琴比赛第三名的，同时还得了玛祖卡特别演奏奖。但57年傅雷先生被打成右派遭到整肃，傅聪真是聪明，看出中国的情况不适宜他的艺术发展，便毅然出走。今天我们实在庆幸傅聪的选择，否则他必是死路一条。我们再看顾圣婴，她那时是一心靠拢组织，积极进行思想改造，想要随着主流意识形态走。什么下农村、去工厂，为工农兵演奏，让钢琴艺术革命化，这些她一点也不反抗，而且还努力实行。文革前，她对那些用红歌改编的钢琴作品，也以极负责的艺术态度来学习和演奏。像什么“洪湖赤卫队组曲”，“翻身日子”，“高举革命大旗”之类的作品，她也投入演奏，甚至把钢琴搬到上海重型机械厂的车间里，去给工人弹琴。那些改造自己的努力一点没少做。可是她内心充满矛盾和痛苦，在贝多芬和红歌之间辗转徘徊。她在灵魂深处酷爱那些伟大的音乐作品，酷爱肖邦、莫扎特、贝多芬。可在中国那个荒谬疯狂的世界里，她又怕自己的爱，怕自己的阶级立场站错了，何况她的父亲还在劳改营里，她不能不处处小心。她的许多朋友，像殷承宗、鲍蕙乔都提到顾日常生活中的忧郁，她活得沉重，心里有苦说不出。不能把所爱奉献给艺术，对一位艺术家是件多么痛苦的事儿啊！所以我听顾圣婴的录音，觉得她演奏肖邦特别有味道，因为她不知不觉地体会到肖邦音乐中的那个 *zai*。这是个波兰词，意思是屈辱与痛苦。

问：据说顾圣婴是在知道傅雷夫妇自杀后，决定一死了之的。

答：可能有点儿关系。傅雷是看着顾圣婴长大的，也给过她一些文化上的影响。顾对傅是相当尊重的，但66年八月底傅家被抄，傅雷被揪头发罚跪，惨遭毒打，傅先生和妻子双双自杀，顾一定是知道的。顾当时在上海音乐学院也是同样的遭遇，可以说是受尽屈辱，像顾圣婴这样一个玉洁冰清、心地善良的弱女子，竟遭那些野蛮的粗汉掴掌，她不能忍受红卫兵的凌辱。一个人自杀而死，反映个人的绝望。但全家一起自杀，满门灭绝，反映的是一个社会阶层对这个社会的绝望。顾圣婴死后，她的个别朋友痛惜之余，对她的自杀还有些不理解，比如刘诗昆先生。他竟然认为顾圣婴受的折磨还不够，不至于去自杀。这是很可笑的。生死的抉择不是以受苦程度来计量的，它表示的是心灵的绝望。这些在我的文章中有详细的分析。最可怜是77年顾高地先生从劳改农场释放回家，到上海才知，全家已在67年1月1日告别人世。人间遭遇之惨烈，莫过于此吧。在毛发动的文革中，顾圣婴只是一个小小的牺牲者，这样一位天才，死后连骨灰都不知哪里去了，后来开追悼会时，摆在灵台上的骨灰盒是空的。顾小姐真是埋香无处啊。去年我在巴黎爱乐厅欣赏波利尼的音乐会，看他演奏后观众的欢呼，不由想起58年和他并立奖台的顾圣婴，文革的罪孽，真是罄竹难书。希望那些唱红歌的人，想想他们的死难同胞。

□ 原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网

~~~~~

【史实辨析】

评舒声对《抢救记忆》之评（上）  
——兼谈北大文革史中的几个问题

• 王复兴 •

《文革博物馆通讯》于2017年3月6日（zk1703b）刊登了北大校友舒声的《评王复兴的〈抢救记忆〉》一文。笔者首先感谢舒声校友对拙作的全面评价及校对、指正。舒声此文涉及北大文革史的许多方面，笔者对舒文的许多观点和所述史实不能认同，本文仅就舒文涉及北大文革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与舒声商榷并阐述如下：

一、关于北大1967年分裂的原因

北大为什么在1967年分裂成两大派？舒声认为：“凡是有一点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是内因起决定性的作用，外因只是变化的次要因素。”舒认为，北大分裂的内因仅仅是因为聂元梓单方面地压制了持不同意见的师生。说“聂元梓掌权后便得意忘形，独断专行”，“在整风中拒不接受群众的正确意见，”对“大批干部、教师，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从而使“许多人不得不走上反对她的道路。”包括他自己。

舒声在这里谈“哲学常识”，谈“内因”。但内因是指事物内部的“对立统一”，是指事物内部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矛盾双方。北大矛盾的另一方，即从“新北大”分裂出去的师生是什么状态？有什么问题？舒避而不谈。这就不够公正、客观、全面，也不符合他的“哲学常识”。从1967年6月至8月，反对聂元梓、校文革的“井、红、团、零、飘”及后来由他们统一起来而成立的“井冈山兵团”，其公开的主流口号是：“二次革命！”“全面夺权！”“砸烂校文革！”“摧垮老保新北大公社！”“打倒聂元梓、孙蓬一！”这些口号被他们以大标语和大字报形式张贴于满校园，并被他们的广播台经常高喊。在这种思潮推动下，“井、红、团、零、飘”做了一系列过激的事情，例如：1967年7月10日，曾发生“团、零、飘”冲击校文革广播大会，围攻、殴打孙蓬一的事件；7月10日，“团、零、飘”打砸抢、查封北大“保卫组”事件；7月初，我在办公楼主持“公社66串连会”的形势讨论会，被牛辉林带领“红旗飘”冲击会场，把我推下主席台，牛还对我胸口踹了一脚；8月24日，“井冈山”绑架、殴打“北大保卫组”组长谢甲林至伤残，使谢患严重脑震荡；12月30日，“井冈山”绑架了校文革结合的干部崔雄昆（前北大教务长、校文革斗批改负责人）；1968年1月16日晚，“新北大公社”邀请西藏“大联指”来北大文艺演出，两派师生坐满大礼堂，“井冈山”武斗队却抢走大喇叭，打砸校文革办公室，但“公社”迅速维持好秩序，恢复了演出。

1967年8月17日，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北京公社、红旗飘、新北大井冈山公社、东方红公社（简称团、零、飘、井、红）联合起来，成立了“井冈山兵团”并发表《宣言》称：“我们新北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就是在与彭真、陆平黑帮的搏斗中，在与张承先反革命工作组的搏斗中，在与刘邓黑司令部的搏斗中冲杀出来的！新北大校文革聂元梓、孙蓬一 etc 同志把新北大公社作为他们执行反动路线的御用工具。他们分裂中央文革，炮打谢副总理，动摇北京市革委会的革命权威，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工农夺权……。是可忍，孰不可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一泻千里，不可抗御！……试看来日之环球，必是毛泽东思想的新世界！试看来日之北大，必是毛泽东思想的新北大！”“打倒刘、邓、陶！打倒彭、罗、陆、杨！打倒陆平、彭佩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以上“井冈山”的成立《宣言》不但表达了他们的极左纲领，也反映出一种狂热的“革命豪情”。很明显“井冈山”的许多师生当时深受极左思潮影响，充满马列毛之暴力革命的激情，以阶级斗争为纲，把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视为阶级敌人，视为旧的国家机器，要“砸烂”、“夺权”。这种把人民内部矛盾当着敌我矛盾来对待的思想、行为，这种在文革中流行的革命思维模式，这种不断造反、永不停顿的行动，是不是北大分裂的重要“内因”？当然是！

实际上，当年北大两派师生、干部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断革命”、“路线斗争不可调和”的思想。当时两派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相同旗帜下，开展着激烈的内斗。只不过是“井冈山”比“公社”更左，因此“公社”被“井冈山”骂为“老保”。时至今日，舒声仍站在派性的立场上，把“井冈山”一派描绘成正义、革命的一派，罪责全是聂元梓、校文革和“公社”群众的，这能说是客观、公正、全面的吗？符合历史事实吗？难道不应自省吗？

其实当年“井冈山”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井冈山”的核心人物之一郭罗基近年对笔者说，他当年并“不同意‘井、红’要打倒聂元梓”，“要打倒别人，结果自己被打倒。”而他“始终是坚持要给聂元梓整风”。后来两派内斗越演越烈，他也不可能控制“井冈山”的大局了。

“一个巴掌拍不响”。笔者在书中并没有回避聂、孙、校文革、“公社总部”对北大分裂应负的责任。1967年3月郭罗基贴出给聂元梓整风的大字报后，聂、孙、校文革及“公社”“联战派”对郭罗基、零派（北京公社）群众采取了压制的态度，这是6月5日后北大分裂的内因之一。内因包括矛和盾双方的原因。

舒文说：王复兴书中说的“北大3月的整风波浪，使新北大公社出现一道裂缝，到了6月5日，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来到北大，看准了裂缝，蓄意投下一颗巨石，……从而造成北大的大分裂。”（144页），则过分夸大了陈伯达讲话的作用。事实上，在陈伯达来北大之前，北大已经有几个反对聂元梓和校文革的群众组织成立了，即使没有陈伯达的讲话，北大两派也是要分裂的。舒否认陈伯达6·5讲话对北大分裂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舒声此言差矣！先来看看事实，看看陈伯达1967年6月5日讲了什么？讲完发生了什么？

6月5日清晨天没亮时，陈伯达突然来到北大的大饭厅，对学生讲话，聂元梓听说后也赶到。陈伯达对学生及聂元梓讲，“文化大革命是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你们学校越乱越好，你们校文革摇摇欲坠才好呢。”“北大是一潭死水，不行啊。没有波浪有什么意思？”“聂元梓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笔者注：陈伯达6月5日清晨有没有到北大讲过话？对这一史实人们争论较大，我是根据聂元梓的《回忆录》及《口述自传》及笔者本人的记忆，确定此事为实。陈伯达6·5针对北大有两次讲话，一次在6·5清晨天没亮时在北大；另一次是6·5深夜在人大大会堂。6·5清晨在北大大饭厅的讲话，聂元梓口述录音带整理的《口述自传》中，对陈伯达6·5清晨在北大大饭厅附近的讲话，有详细回忆的记录。我在6月5日上午在校园已看到大字报《陈伯达讲话》，其中印象最深的一句即“北大是一潭死水”。这句话陈伯达6·5晚在人大大会堂没讲过。但这句话在6月5日、6日两天就已在北大传开了。许多北大校友都记得在6·5日、6日已知此句话。那么陈是在什么时间讲的呢？应该就是6月5日清晨在北大讲的。陈的这句话极具杀伤力。它意味着北大必定分裂，必定大乱。当时对我震撼极大，记忆深刻。米鹤都编撰的聂元梓口述史《往事与尘埃》中的《九十回眸》第272页也记载了完全一样的史实，证实我的记忆无误。）

6月5日晚至6月6日凌晨，陈伯达针对北大做了第二次讲，他在人大大会堂中央文革接见首都红卫兵代表的会议上，对聂元梓、“新北大公社”说，“你们要用吴传启这个名字来做内战的口实，一定要垮台。”（陈再次不让新北大反吴传启，但话说得比以前重多了，威胁聂再反吴要“垮台”。）并且对聂、孙挥舞大棒，说“你们现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想夺无产阶级的权。”这是陈伯达针对北大的第二个“6·5”讲话。

当时中央文革威信极高，如日中天，权倾天下。陈伯达做为中央文革组长在6月5日针对北大二次讲话，如此上纲上线，挥舞大棒，如泰山压顶，是要把聂、孙、“新北大公社”压垮，阻挡以新北大为首的北京反吴传启、反王、关、戚的浪潮。对陈伯达“6·5”两次讲话无需深入解读，其意很明白：第一，他挑动北大分裂；第二，他要北大大乱；第三他煽动反聂元梓，上纲上线，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第四，他是要阻止新北大反吴传启的攻势。陈伯达做为中央文革组长，讲出如此重话，会产生什么效果？那是可想而知的。

6月5日以后，紧接着三天：6日、7日、8日发生了什么？

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

6月6日，“新北大井冈山公社”（注：人称为“井”）成立，发表宣言。脱离新北大公社，反对聂元梓、校文革。

6月7日，“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注：人们称为“团”）成立。造“新北大公社”的反，造校文革、聂元梓反。历史系“延安战斗队”的靳凤毅是头头之一。

6月8日，“新北大北京公社”（注：人们称为“0”）成立。反对聂元梓、校文革，骨干是化学系0363战斗队，头头是陈醒迈，郭罗基参加。“0”派人数较多，约有1000人左右。

此前于5月17日成立的“新北大东方红公社”（人们称为“红”，仅有几个人，头头是樊立勤）和5月22日成立的“红旗飘战斗队”（人们称为“飘”，有十几个人，头头是牛辉林）这两个组织较早时在5月分别发表“宣言”，造校文革、聂元梓反。他们在5月成立时人数极少，影响很小，但6月5日后突然变得活跃，有了一些影响。

事实表明，笔者并没有“过分夸大了陈伯达讲话的作用”。反而舒声不知为什么要极力回避陈伯达6·5讲话对北大分裂的决定性作用。舒说“即使没有陈伯达的讲话，北大两派也是要分裂的。”这就完全是脱离事实的猜测和妄断了。

舒声讲“哲学”，说陈6·5讲话是“外因”，只起次要作用。但“外因”在一定条件下会起决定性作用。正如水的结冰虽然与水的分子结构、水的性质有关，但只有当外部条件（温度）到了摄氏0度，水才会变成冰。这时，外部条件0度便起了决定性作用。再如，文革时期1966年10月至12月的全国各地的造反大潮，其发生、发展固然与各地官民矛盾的积累与激化有关，与工作组“抓游鱼”、“反干扰”，抓右派有关，但没有中央的《五一六通知》，没有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个“外因”，便不会形成全国各地炮轰各级党委的造反大潮。在1967年的北大，没有陈伯达的6·5讲话，北大便不会大分裂，便不会形成两大派，便不会陷入旷日持久的“内战”，直至武斗。

哲学常识告诉我们：事物发生质的变化之原因，总体上内因是第一位的，外因是第二位的，但这种地位并不是绝对的、凝固不变的。同任何矛盾的对立面一样，内因和外因作为决定事物变化的两个矛盾着的方面，其主次地位也是互相转化的。在事物的变化和发展的过程

中，内因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作用，然而，当着缺乏一定的外部条件，内在根据所包含的事物变化的可能性不能变为现实性的时候，外部条件的创造就起主要的决定作用了。舒声否认外因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性作用是伪哲学观点，不符合自然和社会变化的常识。1967年6月5日后北大的大分裂，决定性的因素是陈伯达的“6·5讲话”。

## 二、关于哲学系左派的分裂

“新北大”的分裂，与哲学系左派的分裂关系极大，有必要进行回顾。哲学系左派是指文革前夕在社教中哲学系给陆平党委积极提意见的那些干部、党员、教师，后来这批人在“国际饭店会议”中被重点整肃。文革中北大师生都习惯性地称呼他们为“哲学系左派”。第一张大字报的七名作者就都属于这个群体，他们对北大的运动影响很大。这是北大文革运动有别于清华等高校的一个重要特点。

舒声认为北大分裂与聂元梓对孔繁、杨克明的排斥有关。舒文说，聂“在校文革内拉帮结派，排除异己，先后把昔日的战友孔繁、杨克明打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清除出校文革”。舒的此一说法不符合事实。事实是哲学左派的分裂与康生插手北大运动有直接关系。2017年1月21日，在一次北大校友的聚会，李清昆说，“文革前和文革后，我和孔繁关系都很好。文革后孔繁对我说，‘哲学系左派的分裂，杨克明另搞一套，张恩慈起了很坏的作用。’张恩慈与曹轶欧近，张恩慈的所作所为与康生、曹轶欧对北大运动的看法与作为有关。”王力在其《王力反思录》中（香港北星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5月第三版）第394页指出：“康生同大字报也有关系，他把大字报送毛主席，毛主席指示是他传达的，他就把功劳归于自己。……曹轶欧不同意把聂元梓捧那么高。康生对聂元梓一贯印象恶劣。毛主席、江青都重视聂元梓，曹轶欧觉得过分，就揭她的底，说大字报她一个字也没有写，主要是杨克明写的。……曹轶欧强调杨克明，十一中全会吸收北大的人参加时，江青提聂元梓，康生提杨克明。”张恩慈把以上中央对北大运动的分歧，告知了杨克明，引起杨克明自我膨胀，认为自己是大字报的真正作者，功劳最大，于是争功。当时因孔繁是校文革副主任，聂元梓无法安排杨克明任副主任，只安排了杨克明负责《新北大》校刊。杨克明认为自己没能在校文革任要职，是聂排挤他，于是走上反聂、反校文革之路。舒声被派性模糊了双眼，凭主观想象，妄断是非，把以上的因果关系搞颠倒了。

1966年6月1日以后，由于第一张大字报被毛主席高度赞誉，并在全国广播，杨克明强调自己是大字报的真正作者。但在5月25日至31日这期间，当陆平组织北大师生围剿第一张大字报，七位作者面临被打成右派、反党分子、反革命的巨大压力时，杨克明却是另一种表现。

聂元梓在其《回忆录》第141页（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版）写到5月25日晚上的情景：

“晚上，杨克明回到学校，看到大字报贴出后的混乱情况，又害怕又着急，他的态度改变了。”“杨克明要我立刻把张恩慈找来。当时我就打电话给张恩慈，……。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张恩慈来到北大二十二楼杨克明家里，我们都在这里守候。张恩慈见到我们，没有多讲什么，他只说领导要我们把大字报抄一份给他，送给中央文革和党中央看看。张恩慈来了以后，杨克明又对他发火了，他说，你们现在怎么都不吭声？你们知道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会怎么样？”

2017年1月21日在北京一次北大校友聚会时，第一张大字报作者之一高云鹏说：“5·25大字报贴出后，压力很大，杨克明见到我，质问、埋怨我，说我代他在大字报上

签名，为什么不通知他？我说，‘你不在，我想大字报是你写的，就代你签名了。如你不同意，我可以发表声明，说是我代你签的，你不同意，责任由我负。’杨克明没说什么就走了。”

### 三、关于周培源

舒声在文中说，“连被中央明令保护的科学家周培源也被他们打成‘美国特务’，设立专案，并企图抄家抓捕。”舒的此一说法没有证据，完全是不实之词。周什么时间被校文革打成了“美国特务”？谁设立了周的专案？凭什么说校文革企图对周抄家抓捕？舒没举出任何事实。

事实与舒之言正好相反。《文革博物馆通讯》2017年5月2日（zk1705b）刊登了文革时期北大校文革保卫组负责人谢甲林的文章《评舒声和郑实的谎言》。该文对周培源自始至终受到校文革保卫组的保护有详细的回顾。谢文指出：

1966年6月22日，我（注：指谢甲林本人）到北大工作组报到。……让我到二组（保卫组）任副组长。组长蔡润田是海军保卫部副部长，组员36人，都是海军保卫部干部。在燕南园63号和66号办公、住宿，主要承担：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员来北大时的安全；周总理确定的6名国家级重点保护对象的安全；北大师生和外校师生以及社会各界到北大看大字报和大串联的人身安全；维护北大的治安，保护北大财产的安全；自行或协助北京卫戍区和公安局，上报和侦破反革命案件；其他刑事案件和自杀案件的勘查、处理工作。

1966年8月4日，中央文革宣布撤销北大工作组，在大会上，聂元梓请求，中央文革批准，万人大会通过，宣布留下二组原班人马，继续承担北大的安全保卫工作。校文革成立后，二组改称保卫组，由抗战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北大人事处副处长、校文革第一副主任白晨曦主管，仍由蔡润田任组长、我任副组长。……经总政批准，海军人员于1966年12月撤离北大。因高检院被砸烂不能报批，我不能撤离，白晨曦让我接任组长，从法律、哲学、中文等系选调九名学生、教员、干部，重建保卫组。1968年8月19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校文革及其所属组室全部停止活动，独留保卫组继续工作，仍然让我任组长，接受宣传队指挥部领导，由军代表李志刚联系。经谢富治批准，1969年1月24日我离开北大回到高检院，

谢文又说：“文革”刚开始，北京卫戍区通知北大工作组：周总理指示，北大的周培源、翦伯赞、冯友兰、饶毓泰、闻家驊、温特（美籍教授）为国家重点保护对象，要北大做好他们的保护工作。为此，二组（保卫组）采取了几项重要措施：一、给每人每户参照军队的做法结合北大的实际情况建立了警卫档案，写明了他们的家庭住址，人口情况，四方邻居，从事职业；二、副组长陪同组长挨户走访，向对方说明他是周总理确定的国家级重点保护对象，告知保卫组的住址、电话和联系人，问他们有什么要求和情况，随时向我们反映；三、编绘了每人每户的平面图，选定了巡逻路线和放哨地点等；四、安排了24小时轮流值班，电话记录和每人每户的具体保护人员。在工作组和校文革时期，六名重点保护对象和家庭没有发生任何安全问题。

谢文说：众所周知，打、砸、抢、抄保卫组的后台是陈伯达。……1967年7月10日凌晨，陈伯达来北大，被反对校文革的群众组织“红旗飘”、“北京公社”等围住，牛辉林等借机诬告说：北大有个工作组留下来的黑二组，是个特务机构，他们不作保卫工作，专整革命群众的黑材料。陈伯达随口说道：“那就叫他们停止工作。”陈伯达讲话后不到两小

时，牛辉林等人便带领“红旗飘”等组织的群众到燕南园63号打、砸、抢、抄了校文革保卫组，扬言抄出两批由二组整的“黑材料”。他们对周培源说：“黑二组是个特务机构，不光整了革命群众的黑材料，还整了您的黑材料。”周培源说：“他们是特务机构，就应当砸烂。”接着，牛辉林等一些人在大饭厅举办“黑材料”展览，我亲自去看了这个“展览”。所谓抄出的由二组整的“黑材料”，其中之一，是工作组二组时期给六名（周培源、翦伯赞、冯友兰、饶毓泰、闻家驊、温特（美籍教授））国家级重点保护对象建立的警卫档案，其中第一卷是周培源的警卫档案。为此，我带领保卫组分管警卫工作的周俊业和分管办案工作的蓝绍江以及协助警卫、办案工作的校卫队干部肖祖德，亲自到周培源家，予以澄清。我们当面对他说，我们都参观了“黑材料”展览，牛辉林等人告诉您所谓“黑二组”整了您的“黑材料”，是工作组二组为您建立的警卫档案，当时二组组长蔡润田和副组长谢甲林亲自到您家访问过，已明确向您告知：您是周总理确定的国家级重点保护对象，并把二组的住址、电话号码和联系人等写在一张纸上给您了。以后，又把对您的保护工作，在档案中作了记录。现在，您竟说“保卫组是个特务机构，应当彻底砸烂”这样的话，这是有失身份的，望您检讨、道歉。否则，我们就无法保护您了。

1967年8月17日，“红旗飘”、“北京公社”等五个反校文革的群众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周培源出席成立大会讲话，出任核心组组长，牛辉林等四人任副组长。从此，周培源离开家，住进28斋兵团总部，保卫组就无法对他实施保护了。8月24日，我被井冈山兵团绑架毒打致伤，保卫组停止了工作。后经校文革、北京市卫戍区、公安局请示，谢富治批准：“同意恢复工作，材料也应交回。”为了继续做好周总理指示的国家级重点保护对象的保护工作，我把周培源上山担任井冈山兵团领导和已离开家入住28斋总部的情况，通过卫戍区上报给周总理。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1968年2月13日，谢富治向聂元梓传达周总理让周培源下山的指示：（一）周培源在国际上有影响，下个月他要出国，要他下山；（二）周培源要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三）周培源是以北大副校长身份出国。接着，北京卫戍区通知保卫组转告周培源，说：“李钟奇要给他传达周总理的指示，让我们把他送到卫戍区。”我亲自到28斋井冈山总部找周培源，被堵在门外，不让进去。我又到他家谈明情况，询问他在井冈山总部的电话号码，他妻子不愿告知，最后，我请他妻子给周培源打电话，要他给保卫组回电话，并告知了电话号码。第二天，通过电话告诉周培源说：“李钟奇要你到卫戍区给你传达周总理的指示。”他没有拒绝，但是，担心交通、安全问题。我说：“请您放心，给您派专车，保证您往返安全。”周培源同意后，我对他又说：“明天上午9时，我和专军在28斋东门前30米处路上等您，您从28斋的窗户上看到时，我们俩人相互招手示意，我就到门口接您，把您送上专车，我会告诉司机蔡师傅，事关重大，往返务必保证安全，有什么情况，随时给我电话，我把电话号码给了他。”不到中午，周培源安全回到北大，又进入28斋井冈山总部，我们保卫组的任务就圆满完成了。

周培源从北京卫戍区返校后，井冈山兵团总部召开内部串连会，让周培源介绍李钟奇等传达周总理指示的情况。周培源从井冈山总部回家居住后，我曾亲自登门访问过，他对牛辉林、井冈山等打、砸、抢、抄保卫组，绑架并毒打我的行为，主动认错、赔礼道歉。我对他说，按照周总理关于国家级重点保护对象的指示，我们将继续而且进一步加强对他和家人的警卫工作，再次告诉其保卫组的电话，有关人员、财产和其他安全问题，随时联系，保卫组一定做到随叫随到，全心全意为他们的安全服务。他深受感动，一再赔礼道歉。

以上，谢甲林对校文革保卫组保护周培源的情况，作了详细的回顾。

在打派仗时，“公社”方面个别人写大字报，造谣、诬蔑、攻击周培源是“周白毛”、“美国特务”，这是极端错误的，但与聂元梓、校文革是无关的。文革中的群众运动很混乱，群众并不是百分之百与本派领导保持一致。

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1968年2月13日，谢富治向聂元梓传达周总理让周培源下山的指示，周总理明确指示周培源应“下山”，退出“井冈山”，应“支左不支派”。总理批评周培源应“不支派”。周培源当年不仅“支一派”，而且参加一派，参加打派仗。周培源作为一名科学家，这显然是很不恰当的错误行为。周总理批评并纠正了周培源这种不恰当的错误。

（未完待续）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华夏文摘》网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邮箱： <a href="mailto:tougao@cnd.org">tougao@cnd.org</a> 其它事项请电邮：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             |          |

---